



第154期

E-mail: zqgg8840@sina.com

践行总书记的嘱托 深耕爱国主义教育

□梁春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参观了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在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要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博物苑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进一步讲好张謇故事,弘扬张謇“爱国情怀、开放胸襟、创新精神、诚信品格、社会责任”的爱国企业家精神。2021年元旦前夕,南通博物苑举办了《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专题展览。专题展区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博物苑为开篇,以张謇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为主线,通过实物、图片、声光电等方式全方位展现张謇生平事迹,彰显张謇企业家精神时代价值,着力打造激发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专题展览共展陈80余件实物、13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南通博物苑指明了前进方向,增添了澎湃动力。南通博物苑不断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功能,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军营、学校、社区等策划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内涵丰富的精品巡展、讲座、社教活动;南通博物苑与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专业收藏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获得了更多与张謇有关的文物史料;南通博物苑与国内多家知名高校合作,在学术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教育、讲解培训等领域提升各类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南通博物苑与国内知名文创企业联合设计、研发相关深受观众喜爱的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南通博物苑全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弘扬张謇爱国企业家精神,深化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爱国基因、弘扬爱国精神,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社会担当。立志成为培育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积极打造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引擎,扛起新形势下南通博物苑的使命担当。



宣讲者的获得感从哪里来

□曹荣琪

一名宣讲者,真正的获得感在哪里呢?不在台上的露脸里,也不在台下的讲课费里,而是在所讲内容的接纳度里。

最近作了一场宣讲,一场教怎样宣讲的宣讲。讲完后不到二十分钟,就有学员发来微信,“听了您的宣讲之后,我回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了这本书(《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我极为开心,这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啊,我的获得感。作一场理论宣讲,心中想要得到的,不仅所讲的内容能够在思想上启迪人,更能鼓励人马上去做。

基层理论工作任务有三句话: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理论宣讲是理论工作的一种方式,同样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前面的是理论宣讲者,后面则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样一个逻辑相当清晰,理论宣讲→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实现发展。这是一条工作链。

但也不是所有的理论宣讲都能作用于后面的四个环节,有些宣讲看似是讲了,但接纳度低,会场里那么多人在玩手机甚至打瞌睡,那还有多大实效呢。

作为讲者,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获得感,尽可能增加自己的获得感,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更多人真正接受理论,产生感悟、得到激励、立即行动。

从一场宣讲中,听众的获得,除了“理”的获得即理论视野开拓(信息和要求)、工作启迪启示等外,还有情感的获得,这是需要讲者带入的。

怎么做呢?我从自己的探索中提炼出两条,一条是用听众的获得感赢取讲者的获得感,一条是用听众的体验感争取讲者的获得感。

用听众的获得感赢取讲者的获得感——这句话,是我给自己写的宣讲座右铭。

实现的途径是,在备课时不仅把所讲的内容尤其要点安排妥当,还要精心安排好“大中小”三个层面的事例,“大”就大到世界、全球性事件(如新冠疫情、科技革命、军事行动、政治要闻),“中”就中到生活哲理(从生活出发,挑选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最能让听众感同身受),“小”就是有细节的故事(尤其那种深深感动自己落泪的故事,钻入了听众的心里)。

用听众的体验感争取讲者的获得感,最好的渠道是情境化宣讲。情境,不但有境,境中不但有物理的实境,还有精神的境界;情境,更要有情,有正能量,有向上向善的东西,有人性中质朴热烈的东西在听众的心灵中穿行,体验喜怒哀乐,可悲可歌。表达的方式也可不拘一格,为讲而用,服从效果。

记得那场宣讲一结束,就有学员感叹,这两个小时过得怎么这么快,意犹未尽。更有几个学员热烈地拥上来交流,表达感受。这些,都是我的获得感。

张謇谈论哲学—— 哲学是高尚的空气

□梁林军



19世纪70年代,“哲学”一词由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参考古汉语,将西方的“爱智之学”意译为东方的“智慧之学”“先哲之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后日渐通行,一直沿用至今。也大约在此之后,大教育家张謇对西方哲学学科的内容和性质有了一定了解,他不仅把自己对《易经》的推崇转化为对哲学学问的崇尚,而且在其创办的高等学校中也注重哲学课程的设立和哲学学科的建设。

一、哲学是高尚的空气

1920年,张謇请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南通讲学,在欢迎词中说:“博士于哲学研究有年。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近世能以哲学灌人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张謇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是,与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相比,哲学的作用最大,哲学是新鲜、洁净的空气;空气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人又赖之以维持生命;哲学讲的都是高尚、形而上的道理和内容,哲学概念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一一对应的事物,但是人、国家和社会如果不能用哲学进行思考、进行哲学性的反思,就会缺氧、不能呼吸,日渐陈腐、无用。美国的“共和”制度在政治制度和理论的重要创新,但“共和”的思想不是天赋,也没有现实可以循照,如果不是美国人坚持对政治、政体、政治制度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和探索,使得哲学可以进入政治和教育领域,美国也很难有共和制度的创造,甚至影响于世界。可见,哲学因其高尚,与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而现实恰恰因为这种张力而得以不断生发和展开。

张謇认为哲学是高尚的,在道德与伦理上具有崇高性。“诸生知无古今,无中外人所重者,何等人乎?明公理、修公德之人则人重之,有礼法、不苟简之人则人重之,能成一业之人则人重之……一事也如何而能明是公理非公理,是公德非公德,是有礼法而不苟简,是无礼法而苟简,是能成业,是不能成业?是有界限,有分数,如何而能明界限,能明分数?试问不讲心理得乎?心理者,进于伦理而渐近于哲学之阶梯也。”张謇认为,纵观古今中外,人们尊重三种人:一是明公理、修公德的人;二是有礼法、不草率简陋的人;三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这些人之所以为铭记,首先是因为他们善于区分公理与非公理、公德与非公德、有礼法与无礼法、不苟简与苟简、成业与

不成立,他们有界限感,善于区分,凡事心中有数。张謇提出“心理”的概念,他将伦理、心理与哲学并列,说明是将三者置于学科名称的角度;张謇已知“心理学”,但是对他“心理学”的理解是有道德性、伦理性的。在他看来,“伦理学”是指导人们具体道德规范的学问;“心理学”高于“伦理学”,是教人们从内心判断界限,辨别分数,从而在具体行为规范上做到私德进、公德修的学问;“哲学”则还要高于“心理学”,“心理学”是接近“哲学”阶梯的学问,哲学涵括最崇高、最高尚的道德与伦理问题。由此可见,张謇用“高尚”一词修饰“哲学”,是因为哲学追求最普遍的道理,恰恰是秉承最广泛的公心,探求最广泛的公理与公德,正因为如此,在伦理和道德价值判断上,哲学是“高尚”的学科和学问。哲学是崇高的空气,是高尚的空气;哲学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而恰恰是对国家、社会和民生有最普遍、最崇高关怀的学问。

二、中国自古已有哲学

张謇认为,《周易》是最早的哲学著作。“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周易》正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礼记》中哲学性的思想也有很多。《周易》和《礼记》这些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新鲜、高尚的“空气”,它不仅滋养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而且因为其“高尚”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张力,于无声无息处助力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张謇认为,中国的十三经中,《周易》《礼记》(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哲学、教育学经典,《尚书》是历史学、地理学经典,《诗经》是音乐学、动植物学经典,《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法学、外交学经典,《周礼》是政治学、经济学、农工学经典,《仪礼》《孝经》是修身学、伦理学经典,《尔雅》是国文学经典。“今各国之言教育者,谋普及国民之知识,而以我诸经视其学科,则《易》《礼记》《论语》《孟子》当哲名,《大学》《中庸》当历史、地理学,《诗》当音乐、动植物学,《春秋》三传当法律、外交学,《周礼》当政治、经济、农工学,《仪礼》《孝经》当修身、伦理学,《尔雅》当国文学。”今天看来,张謇当时对于西方学科与中国传统典籍的理解、认知和融通的尝试是基本客观和准确的。

张謇具体举《易经》和《礼记》中“圣”字为例。“《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圣字从耳,呈声;左边是耳朵,右边是口字,即善用耳,又会用口,耳根圆通,口齿练达。《说文》:圣,通也。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诚而已矣”,朱熹解为:“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即所谓‘太极者也’”。周敦颐讲“诚、神、几,曰圣人”,朱熹注释为:“诚者,至实而无妄

之谓。诚,人皆有之。圣人独能全此而已”。可见,宋儒以“诚”阐释“圣”字,偏离其耳、口皆通的本义。在张謇看来,《易经》《礼记》中“圣”即无所不通的意思,具有超越性,“圣”字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现实世界找不到其对应的事物,但是人不能离开它。所谓“圣人”就是对事理无所不通的人,中国历代士人都以“学为圣人”为人生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三、哲学是诸种具体学科的空气

灵光

在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关系上,张謇对其子张孝若说“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劝其研习哲学。哲学本义是爱智之学,是研究基本和普遍问题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哲学又称为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人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形而上学”一词翻译自英文 metaphysics,字面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或之上)的学科。中文译名“形而上学”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形而上”是研究事物之道的学问,而不是研究具体的学科。爱因斯坦认为如果把科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张謇认为哲学虽然不研究具体问题,但是诸种具体学科却离不开哲学,哲学是诸种具体学科的空气和灵光。“灵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指神圣之光、通灵之光,在佛学文化中通常指人的良善的本性。相较于空气,“灵光”于现实中更难对应,表达人们对自然可见之光以外的更高的、更神秘的、更具超越性的光的追求。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如果诸种具体学科是对普遍和广泛知识的追求,哲学则是对更普遍、更广泛问题的追问和探求。

四、哲学的学习方法

如何学习哲学?张謇认为要多看书,少发议论。多看书可以增长见识、见闻,哲学著作一定要多看、多读,即使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科学课程也要多看,了解各种科学具体学科,更何况是哲学。“必比类而观,乃能知其要;参互以证,乃能会其通。”不同的书之间有详略、见解不同的区别,但也会互相联系,因此类比阅读便于归纳其中的要点,互相参阅阅读便于领会其中的共性。张謇认为学生在学校规定的书本和学校的课程教学之外,应该多看参考书;仅仅靠教科书,涉猎的范围毕竟有限。张謇举交通为例,虽然火车、汽车在交通速度上快捷,但是与步行相比,沿途的见闻则少多了。学习哲学当然应该看更多的书,哲学是研究普遍问题的学问,在熟读哲学原理的同时,应该多读具体的事例、案例和学问,并且如果要做到学以致用,必须博学、

审问、慎思、明辨。张謇引《礼记·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阐发其学习方法,即广泛地学习,反复地追问,周密地思考,洞明地辨别,切实不息地实行。

五、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早在1901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中主张的考试科目中就有哲学一科,文科即史、哲、地理。在《南通文化教育事业基金意见书》中,张謇提出“文科需办哲学与经史地理四科”,其中所谓“经”是指六经,代指国文、国学。张謇谋求向美国申请基金支持南通大学的建设、南通教育的发展,在致美国国务院远东局麦克莫里的信函中说:“拟建之文理学院将设哲学、国文、历史、地理四系。”哲学都是文科学院系中位居首位的建设学科。

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张謇一直是革新派,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因如此,他对晚清维新派的“国粹保护运动”嗤之以鼻。但在民国之后,西方文化和新学的冲击日盛,有人主张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学术,彻底西方化,国文国学日渐式微,张謇对此忧心不已,他认为没有国学,国将不国。“然有主焉,主则国学是已。无学何以为国?此即小国犹然,而况于五千余年泱泱之古国乎!往值前清庚子兵乱,知教之不可不革,而革必有师,乃倡师范学校。校有毕业能为师者,而后倡初等,而及于高等之小学,一以科学矫科举之弊。当是时,来学之士沿科举之余,国学未忘,而科学亦易几于通。”张謇举自己多年兴办教育的经验为证,国学与科学可以并重,即使过去的旧儒生经过系统教育和学习,也可以精通科学。国学与科学并不矛盾,不可走向另一极端,即为了发展科学,废弃国学;国学是国之本,要发展科学,但是不能忘本甚至废本。在张謇看来,国学中最重要的就是六经,其中即有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和《礼记》。

张謇曾称自己“一生得力于易”,儒家诸经之中,张謇对于《易经》用力最多,也应用、实行最多。他从学时曾效仿顾炎武的音韵学研究,致力于易经的音训训诂工作,并著有其一生唯一的一部学术专著《周易音训句读》。但易经之所以成为其一生影响最大的儒家经典,恰恰是因为其哲学性。张謇认为哲学是高尚的空气,《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张謇的一生都注重哲学性的思考和学习。正是因为他尊崇哲学并从中汲取营养,追求哲学的高尚性,对现实抱有反思和批判精神,因此他才迸发出惊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他明公理、修公德,有礼法、不苟简,在实业、教育、地方建设与公益慈善领域皆立下不世之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为后人铭记和敬仰。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企业要积极走数字化之路

□仲跻和



“5G”“物联网”“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智能化工厂”“数字化商业模式”“人才与数字化组织能力”“技术与数字化运营体系”等等,太多的新名称,已令我眼花缭乱、头昏眼花、不知所措。

形势逼人,不适应只有被淘汰。未来的三十年也就是懂数字化、会数字化,且得心应手的企业人的天下了。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怎么办?

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唯有主动去拥抱数字化,与数字化成为朋友,从自我开始,从团队着力,先解决团队的数字化。然后再从技术、运营诸方面实施数字化,最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不是一个遗弃儿。

怎么数字化?原来我想象的太简单了。我以为只要找到一个优秀的操盘手,再加上舍得投入就可以了。而当我读了《数商:工业数字化转型之道》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

数字化,首先是企业一把手的数字化。不但要知道数字化,而且懂得数字化,还要能够数字化。这个“能够”不是操作,而是要知道数字化转型之道,懂得应该怎么走、不应该怎样走。

“数字化转型铁三角”给予我很好的启示,“人才与数字化组织能力”“战略与数字化商业模式”“技术与数字化运营体系”彻底颠覆了我“以点带面,逐步完善”的想法。

数字化转型之道从决策准备实施数字化开始,到找到实施数字化的团队,再与团队探讨数字化战略,以及实施战略的路线,最终制定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的技术路线图的运营模式与体系。既存先后之别,又有相互协作,是个系统工程。

企业的产品技术尚需完善。通过不断地攻克克难,形成企业的独特技术,然后再把独特的技术转化为数字化的能力。打破技术与技术、技术与生产、技术与质量、技术与成本、技术与客户、技术与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壁垒,找到一个适合的、合理的、合情的切入点,从而形成企业内部、企业与市场的双循环的数字化运营体系,形成企业的数字化的产品、技术、服务与盈利模式。

这样复杂的工作,靠企业现有的团队,真的是难为他们了。如果还是因循老路,肯定没有出路,唯有变才能有机会成功。

到底怎么变?“异地办公”“合作分享”“不求所有,只求可用”,都是已有的理念,但还未形成完整的思路,需要加

快完善。

近期,海迅集团准备在山东建工作室,解决技术人员的短缺问题;与华为南京研究所合作解决数字化的带头人问题。这只是个开头,还要加快加大改革力度来适应“海迅智造,五年上市”的战略目标。

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将借助于新厂区的建设,以及组建的“海迅制造”的平台作契机。头已经开了,但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作为我来说,要做文化、定战略、找团队。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真要把这三件事做好,需要忘了过去、忘了现在,只想未来。未来已来,不容迟疑。

如何解决现在的商业模式与数字化重塑后的商业模式,有机转换是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棉花机械,还是钢铁加工机械都存在这个问题。理想的状态是现有的团队主动转型,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但实际上很难实现,所以只好在充分发挥调动现有人员的潜力与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大人才培养和培养的力度,优先解决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问题。抓住人才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问题,数字化转型才有希望。在这方面企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重要的是要有胆量与毅力,不要怕变、怕改。担心没有必要,用心才是最好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数字化人才,需要技术、质量、财务、人事人才,更需要管理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是企业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

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任重道远。虽说有徐工集团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又不可以照搬,应着重于整合资源,优化组合,形成企业特色。善于“草船借箭”,可解企业燃眉之急。

(作者系江苏海迅实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